

◎作家近况

李彦：把红色作品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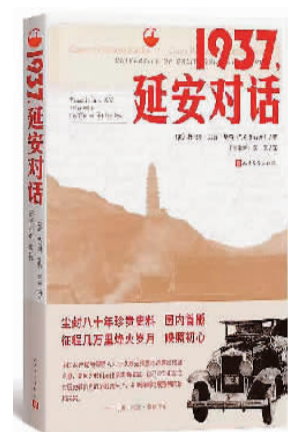
张海燕

从英中双语小说《红浮萍》《雪百合》，到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再到纪实文学《不远方》《尺素天涯》，李彦的创作与翻译总是与中国人文历史、红色岁月息息相关。她近期给我们带来的译作《1937，延安对话》，被誉为“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以真实而自然的访谈记录，客观再现了中共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与思想理论，生动刻画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气质、对中国革命的前瞻性思考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身为游子，对故园总是充满回望与想象，更被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收到《当代》杂志的邀请后，我便积极投入到《1937，延安对话》的翻译中。”李彦说。

然而，翻译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这样一部红色作品，不仅需要对党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还要知道当时的外国人是如何用英语来表达这一切。正如《1937，延安对话》序言中，欧文·拉铁摩尔教授所说，当翻译是个非常不幸的苦差事。因为译者不得不全神贯注应对每一个词组、每一个短句，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对此，李彦坦言：“仅从个人兴趣来讲，我宁愿自己搞创作，也不愿翻译他人的作品。创作时，思绪可不受拘泥，是一种享受；而历史文献的翻译，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译者的耐心和责任是严格的考验。”

李彦举了一个例子，原著中，毕森与朱德会见时提到一句话，是“毛泽东的名言”。若直译这句话，就是“政治让枪口朝前射击”。李彦幼时熟读《毛主席语录》，从未见过这句“名言”。她推测这句话英文应该指的是：“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为了核实她的推断，李彦请教国内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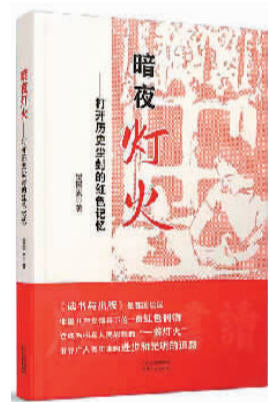
托马斯·亚瑟·毕森著 李彦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专家，最终得到核实与确认，原汁原味译出了这句话。李彦信奉严复“信、达、雅”的标准，认为对红色著作翻译更要遵循“信、达、雅”。她赞同一些学者对三者关系的阐释：“信”“达”两字互为依存，“达”“雅”两字互为联系。“信”是目标，“达”是手段，“雅”是服务“达”的辅助手段。翻译红色著作时，尤其要强调严谨准确（信）、归化性可读（达）、文学艺术化写译（雅）。这在《1937，延安对话》的翻译中有充分的体现，译文中不乏带有汉语特色的成语，如声名鹊起、作茧自缚，和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等中国俗语。李彦通过融入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中文词汇和成语，来增强可读性。书中还可见大量陕西方言以及中国革命年代特定的术语，如红小鬼、陕甘宁边区、农民互助组等。

中外文学双向互译，是李彦近年来关注的问题。在她看来，翻译对讲好中国故事十分重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多都反映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宽厚忍耐、悲天悯人的情怀，非常值得翻译推荐，介绍给世界人民。要加大对青年学生的培养力度，让更多人有兴趣、有能力投入中外文学翻译实践中。”李彦说。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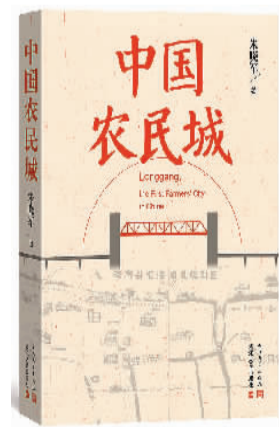
新书钩沉红色刊物中的时代记忆



《读书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份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理论刊物。1935年5月由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刊，两度停刊复刊，1948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该刊编辑人和撰稿人围绕人与书、个人与时代等话题，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彼时读书界、思想界追求真理的心声，是引导“国统区”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奔向进步与光明的“一盏灯火”，也是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传奇。

本书作者樊安从自己收藏的大量《读书与出版》杂志中选出20余万字精粹文章，结合当年编刊人、撰稿人、读者的回忆，专家学者的历史评价，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阅读体会等著成此书，兼具史料性和思想性。

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叙写龙港传奇



本书作者樊安从自己收藏的大量《读书与出版》杂志中选出20余万字精粹文章，结合当年编刊人、撰稿人、读者的回忆，专家学者的历史评价，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阅读体会等著成此书，兼具史料性和思想性。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汪曾祺：『人间送小温』

徐强

汪曾祺被誉为短篇巧匠、文体名家、多面圣手，从上世纪40年代以诗歌、小说、散文走上文坛，中经上世纪50年代的沉寂与厚积，再到晚年凭借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异军突起，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融汇古典文章与现代技巧、延续“五四”文脉而艺术常青的作家。汪曾祺作品中既有民族性，又有丰富的世界性因素，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开展，他的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引起世界文坛关注，为海外读者所喜爱。

先闻其名，后识其作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海外读书界就对汪曾祺有所知晓。1973年，旅居美国的华裔中国文学学者许芥昱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的文艺界》，如实记录了他回中国拜访27位作家、音乐家、演员的经过。其中一篇《舞台上不再是帝王将相》，访谈对象是京剧现代戏《沙家浜》剧组的两位主创人员——汪曾祺和李慕良。这本书成为海外了解中国文艺界动态的难得资料，也让外界了解到汪曾祺的编创工作。

1986年11月，50多位外国汉学家和40多位中国作家、评论家在上海金山宾馆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史称“金山会议”。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当代文学会议。汪曾祺在会上与葛浩文、金介甫、李欧梵、陈幼石、顾彬、易德波、秦碧达等国际中国文学研究者愉快交流，扩大了其本人作品的海外影响。

1987年的美国之行，堪称汪曾祺国际交往中的“高光时刻”。行前，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作家专访稿，称汪曾祺为“寻根文学之父”。当期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27个国家的33名作家，3个月里，汪曾祺除了与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安格乐成为朋友，还与各国作家共同写作、交流、联谊、参访，广泛接触美国侨界、报界、汉学界。汪曾祺精湛的厨艺、幽默的谈吐、敏捷的才思、率性灵动的书画小品、随和而善解人意的交际艺术，使他成为同侪中耀眼的明星。他在爱荷华、芝加哥、耶鲁、哈佛、宾夕法尼亚等各大大学发表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我是如何写作的》等演讲，反响强烈。他在写作计划期间着手的写作项目是“聊斋新义”系列，部分篇章首先在美国《华侨日报》《中报》等发表。《华侨日报》还转载了汪曾祺与林斤澜的一次有关文学社会性与小说技巧的对谈。这次美国之行加深了美国乃至海外学界对汪曾祺和他的文学观的认识。

向世界讲述高邮故事

汪曾祺作品译介到海外，起始于入选面向海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及其“熊猫丛书”。1981年，《大淖记事》甫一问世，就被《中国文学》选中翻译到海外，1984年又入选英文版《当代优秀小说选》。1989年和1990年，“熊猫丛书”先后推出法文版、英文版的汪曾祺小说选。作者特意撰写了前言，即自传散文《自报家门》。其中英文版题名《晚饭后的故事》，收入《鸡鸣名家》《异秉》《受

◎新作评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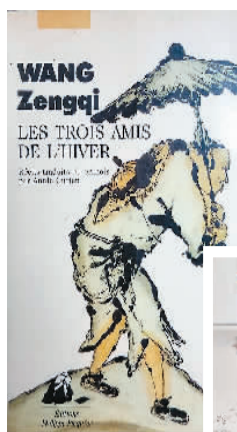
语感是作家的才具

——读强雯《石燕》

罗伟章

任何抵抗都是应答。强雯也如此。她的作品不算多，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还有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石燕》。我读她的作品，始于《清浩》，读后和四川作家王棵交流，我们都认为强雯的语感好。谈论作家的语感，是基本，也是高标，语感是一个作家天生的才具，是文学对写作者的招引和敞开。语感好的作家，文字往往生着翅膀。“看到苗头欣欣向荣，就以为种子会自己长成参天大树，又忙着播下另一个种子”，这是强雯的句子；“月亮越来越亮，需要仰着头，才能看见”，也是强雯的句子——一句“废话”，也是“废话”的背后，是人物的挣扎和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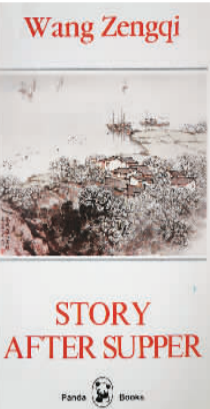
我疗治。文学的翅膀，其实是一种“透”，一种洞察能力。文学需朝深处探望，才有飞升的可能。辨识阳光，呼唤温暖，是强雯想做的。她珍惜那些弱者的生命，注目并体悟他们的困境、无奈和坚持，且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想，都人格化。在她那里，几乎没有激烈的东西，都以沉默的方式洒开，再交给日子慢慢去吸收。她心里有一个强大的背景：时间。是“时间”给了她底气，“时间”也成为她最具力量的修辞。她有一本待出的书，以随笔写文物，而《石燕》也是写一位名叫华绵的文物修复师。这职业本身，在文学的尺度



▲法译本小说选《岁寒三友》，安妮·居里安译
▶“熊猫丛书”小说选《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



◀“熊猫丛书”《当代优秀小说选》英文版
▼美国《青山评论》中国写作专号



林雅静等翻译的《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李三》等作品，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在捷克，1993年汉学家包捷译介了《黄油烙饼》《受戒》等。在日本，汪曾祺有很多知音，除了上述主要作品，还有《鉴赏家》《李三》《桥边小说三题》等被译成日文。汪曾祺小说《小芳》还被编入日本放送大学振兴会出版的汉语教材中，无意中感动过不少学习中文的日本读者。

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通过高邮故事表现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寄寓温暖的人间情怀，引发了国际文坛的浓厚兴趣，使它们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性文本”。安妮·居里安的法译本《岁寒三友》问世后，有书评盛赞小说所表现的中国式情感、气氛，工笔描绘，叙述的简洁与节制，想象的丰富以及对古典散文传统的继承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读者喜爱汪曾祺的原因。

渐成海外研究热点

1988年，在美国、中国召开的两次讨论会，开启了海外学者对汪曾祺的专题研究。当年春，在旧金山一次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加拿大汉学家社迈可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小说的冲突时，以汪曾祺作品为例，指出传统在现代浪潮之下找到宣泄口这一现象。社迈可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关注汪曾祺，认为“其作品的推动力，在于对民族命运的忧心”。当年9月，《北京文学》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法国的安妮·居里安、瑞典的秦碧达、美国的林培瑞等汉学家参会。该刊稍后辟出“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收录了安妮·居里安的《笔下浸透了诗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标题准确概括了作者对汪曾祺作品的阅读体验与判断，也深得汪本人认同。

1992年，赫穆穆·马丁与金介甫合作编辑了《现代中国作家自画像》一书，收录44位作家带有“自画像”性质的创作谈文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察了作家的思想”。有书评指出，汪曾祺的《自报家门》是“精心制作的、有启发性的”篇章之一。1993年，在英国任教的赵毅衡编了《迷舟：中国前卫小说》一书，介绍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潮小说，菲利普·威廉姆斯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赵毅衡在背景介绍中忽视了上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这说明，早在1993年，一些西方学者对青年汪曾祺的创作已有相当认识。而在中国，汪曾祺的早期创作还要晚几年才稍稍引起关注，其早期作品的发掘、编入全集，更迟至汪曾祺逝世20年后。

中国批评家的论述在海外发表，

也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汪曾祺研究。1993年，李陀的《现代汉语的新活力》被收入奥尔胡斯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李陀指出，汪曾祺等作家开启了对汉语美感与特质的探索，汪有意识地重建与古典和白话传统之间的联系，是抵制过度西化的范例。1995年，钱理群的《194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理论概观》译文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杂志发表，高度评价了汪曾祺于1947年的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

汪曾祺有句流传很广的玩笑话，是对自己的晚辈说的：“你们都对我好点啊，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他不仅进入了中国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还是海外中国文学史中的“常客”。2001年，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认为“沈从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称作现代汉语的文体大师。吊诡的是，虽然二人并没有回避外来的借词或者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在现代散文中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古典的审美感受性”。这与汪曾祺本人对自己“文体家”的定位相一致。2005年，德国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谈到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学表现时，举“富有天分”的小说家汪曾祺为例：“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受戒》（1980），反映了他对美和天然的审美观点。这里不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对国家和人民作一个（道德）评判，这里是某个人，某个觉得和江苏的故乡民间文化紧紧相联的人，在描绘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顾彬认为，汪曾祺“描述了一个永恒的、如乐园般的世界”，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不多见的。2010年出版的美《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里，在奚密撰写的“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一章中，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复仇》：“《复仇》的文字既口语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简洁……这个关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满了佛道哲思。”

汪曾祺自述诗中有一句“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的文学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结果，也是世界读者都能感知的普遍情怀。2003年，日本学者德间佳信在致汪曾祺研究会的信中谈及，是汪曾祺的作品使他走上中国当代研究之路，“我认为汪先生是中国本世纪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在的国家为之感动。他的作品不靠什么支配性的文艺理论，荒唐的情节等，而是文学本身的力量创造出充满了象征、美丽的世界，所以，我很尊重汪先生。”这代表了海外学者与读者的共同心声。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已经具有了象征性。华绵对时间的敬意，映照的是小说家强雯对时间的自觉。

与之相应，强雯是安静的。在《石燕》中，有对安静的动人描述：“像那些缄默的石器，秦代跪坐俑，肃穆、安静；唐代仕女俑，柔美、安静；石燕，质密而脆，纹理细腻，带着唐宋的气息，嶙峋、安静。”无论肃穆、柔美还是嶙峋，安静都成为最终归宿，这是强雯对事物的命名。风暴只在低处，只有在有心人能听得见的地方，所以强雯的安静不是隐和寂，而是无需声音的打开，无需拔节的生长，是她对人生与命运经过审视后的态度。在她的观念里，沉淀时间的不仅是文物，还有语言，强雯爱读古书，这让她的小小说有气质上的典雅，仿佛不经意间的一个短句，一首旧诗，就和时间接通。

强雯应该能写出更好的作品。重庆不仅该出小说家，还该出有大气象的小说家。整体而言，强雯目前的作品显得精致了些。精致是优点，也是缺点。伟大的作家，宽阔、深邃，往往使人忘记去关注他们手上的技艺。（作者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强雯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重庆应该出小说家：码头生长起来的都市，盆地边缘的峻岭大川，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和日军连续5年的无差别轰炸……既提供了故事土壤，也把命运置于刃口。可偏偏重庆土生土长的小说家不多。巴山、巫山和长江的巨大，历史突然加上去的重荷，让那片土地显得燥辣且忙于担负。由此就能理解，凡重庆小说家，比如莫怀德，比如强雯，叙事都朝轻盈的路上走。这是艺术对生活的抵抗。